

我在苏丹的外交生涯

刘宝莱

作者简介 刘宝莱,曾任我驻约旦大使,现为外交学会副会长(北京 100006)。

说起苏丹,人们往往同火炉、沙漠连在一起。的确,苏丹位于非洲东北部,红海西岸,赤道附近,年平均气温 21 。最热季节气温高达 50 以上。可以说,一年有 10 个月的夏季,冬季仅两个月。即便冬季,也如同我国的深秋,身体健康的年轻人穿一件长袖外套,老年人套件棉毛衫即可。苏丹常年干旱少雨,年平均降雨量不足 100 毫米。每年 5 月,刮起沙尘暴,黄沙漫天,天昏地暗,汽车都难以行驶。人们只看到面粉状的细沙纷纷落下,地面很快形成厚厚一层,黄黄的一片。当地人称之为“哈布布”。行走在路上,会闻到刺鼻的土腥味,还会将行人从头到脚涂成一个黄泥人。苏丹地处生态过渡带,极易遭受旱灾、水灾和沙漠化。昔日万顷良田大都被细沙吞噬。当地人同自然进行了顽强的抗争,但因缺少资金,只得望沙兴叹,听任大自然的摆布。我曾在我驻苏丹大使馆工作 8 年有余,受到了磨练,经受了考验,与苏丹这块土地结下了特殊的情感。

(一)

1970 年 4 月,我陪杨守正大使赴苏丹履新。这是我从解放军农场锻炼回外交部后的第一次出国,心情既激动又担心。激动的是外交部领导为自己提供了一个加强锻炼、发挥作用的舞台,体现了组织对自己的关怀和期望;担心的是怕完不成任务,胜任不了工作,辜负了领导对自己的殷切期望,特别是去驻苏丹使馆工作更具挑战性、艰巨性和复杂性。因为那里是“重灾区”,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深,人际关系紧张,形成一馆两派,一派以代办(商务参赞)为首,被认为是保守派或称保皇派,主掌使馆内外事务,使之正常运转;另一派是外交部“大联委”派出的一位外交官为首的造反派,对代办工作百般挑剔,要求平分秋色,平起平坐,已

形成夺权之势。两派人马旗鼓相当,互不相让。每次开全馆大会,争吵不休,难以达成共识。争吵的关键在于一个权字。代办认为,他是代办,部里任命,有权决定一切,尤其对外工作,应由他说了算。而这位外交官认为,他是外交部大联委派出的,经受了“文革”洗礼,是造反派,革命性强,故代办应听他的,否则就要夺他的权,建立革命的领导班子。据说,有时他乘代办到外地出差,便在车上挂上小国旗,以代办身份进行外事活动。按照国际惯例和礼宾规定,这是不允许的,但他偏这样做。这样,使馆便形成了“两个司令部”。比如,我国庆招待会请何人出席就有分歧,造反派认为,当地工人、农民等劳苦大众是基本力量,应请他们的代表人物出席,不要请当权派,因为他们是革命的对象。两派对此事进行了激烈的辩论,但在当时国内气氛的影响下,造反派还是占了上风。许多卖菜的、卖肉的、修汽车的、加油的等各行各业的工人、农民代表被请为座上宾,而当权派一位也不请。在此背景下,我到馆工作,压力很大。但我认为要做事,先要做人。只有做好人,才能做好事。要为人正直、诚实、清白、勤奋、公正,否则,一事无成。我曾把我的这些想法报告了杨大使,大使鼓励我按自己的想法去做。他说,“小刘你从部队到使馆工作,跨度不小,面临的是新形势,新情况,新问题,新任务。当务之急,要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两论(即矛盾论、实践论)和学好老三篇。对人、对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,千万不要人云亦云,匆忙行事。”他还说,“你还年轻,革命的路还很长,应珍惜时光,提高阿拉伯语水平,尽快适应工作,真正学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。”听后,我深受鼓舞。不久,保守派的代表找我谈话,要我站到他们一边,并讲了造反派存在的许多问题,要我提高警惕,不

要上当。接着，造反派的代表也找我谈话，拉我同他们一起“战斗”。开始，我只是听听而已，不表态，或一笑了之。后来，两派找勤了，我也烦了，只好摊牌。我告诉他们，自己是外交战线上的新兵，一切从头开始，我担任大使翻译，深感力不从心。因此，我的首要任务是集中精力，抓好学习，读好外报，尽快适应工作。他们看我两派都不参加，成天忙着不是给大使作翻译，就是译每日要闻和看电视新闻，便不再找我了。我也就能专心做业务工作了。

当然，他们之所以放了我，恐怕主要还是与杨大使等使馆主要领导决定解决两派分歧、促成联合有关。当时，使馆领导认真贯彻国内关于驻外使领馆不搞文化大革命、只进行正面学习的精神，花了半年时间，将两派头面人物召集在一起，摆问题，查原因，弄清是非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，终于促成了两派联合。为此，我曾赋诗一首，表示祝贺：

文革使人分两派，无故争闹不奇怪。
领导决心来解决，全馆一致拍手快。
是非曲直要分清，自我检讨抓要害。
消弥歧见大联合，昔日恩怨多化解。

(二)

那时，驻苏丹使馆，只有两名阿拉伯语翻译，一位是潘祥康（后任驻巴林大使），另一位是我。我们二人分别在办公室和研究室工作。随着中苏（丹）友好关系的发展，使馆工作量加大。由于使馆的主要外交官基本不懂阿语，我在这方面的工作就十分繁重。每天主要有：

1.关注媒体。听广播，看电视新闻。每天早晨6点，必须听苏丹电台的首次新闻广播，主要了解苏丹政局。我在那里工作8年，曾发生未遂政变达30次之多。有个星期五（休息日）早晨6点，我在睡梦中听到有人敲门，是王韦平代办，他说，苏丹发生政变了。我忙打开收音机，一听，在放军乐，知道事情不妙，忙作自我批评。王代办走后，我迅速安好录音机，并报告主任。在两小时后，政变被粉碎了。年终总结时，使馆的许多同志对我们提出严肃批评。有位厨师讲：“我们天天为你们做饭，结果你们却忘了大事。”大家的批评没有错，我一度有点抬不起头来。说实话，要做到天天早晨6点听广播，很不容易。苏丹气候炎热，凌晨3时才降温，且经常断电；加之使馆人少事多，我们往往工

作至凌晨1点才能休息，回到房间，洗澡冲凉，两点以后方才上床，早晨6点，正是酣睡之时，年轻人贪睡，总觉得睡不醒。而老同志起得很早，但他们又不懂外文，真是协调不起来。另外，一年到头，只要没有外事活动，就要坚持看电视新闻，包括周末放电影的时候。8年期间，出于工作需要，我从未看过一场完整的电影。有的驻外使馆，晚上搞联欢会，未看电视新闻，结果驻在国发生政变了，使馆却不知道。

2.摘译每日要闻。每天9点前，我必须译出各报的重要新闻，如有政要的讲话，则先译出摘要。全文于当日下午或晚上译出。这是因为使馆领导9点之后开始外事活动，需要了解当地重大新闻。周末，同事们可以在办公室打扑克、娱乐。而我必须译报纸要闻。领导说，这是对我的考验，在乱中集中精力做事，犹如霓虹灯下的哨兵。对此，现在的年轻同志恐怕难以想像和接受。

3.每日给领导口译阿文报纸半小时。领导要求，消息要简明扼要，语言要清楚，综合要全面，说理要明确。开始口译时，我总有些丢三落四，结结巴巴，常挨批评。后来，才逐渐运用自如了。

4.为大使等使馆领导作口译。使馆外事活动多，我在替大使作翻译外，还得为其他领导当翻译，如常常为二秘、三秘外交官作翻译。参加外事活动后，还要整理记录。一次，因整理一份记录，整夜未眠，第二天，送领导参阅时，因字迹潦草，受到严厉批评。当时想不通，感到太委屈，费力不讨好！但等冷静下来后，又觉得领导批评没错，这样有利于完善自己，变压力为动力，把工作做得更好。

5.参与调研，注意收集资料，起草调研报告。使馆这项工作的第一稿和领导同志的讲话稿基本出自我之手。由于苏丹未遂政变较多，此项工作非常艰巨。

6.从事苏丹中国友协工作。应该说，友协为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和民间友好交往做了大量工作，苏丹会员人数也多。有些城市曾提出建立友协分会。但他们需要资金和设备，经常来使馆谈此类问题。这些事情虽繁杂难办，但很能锻炼人的应变能力和处事能力。8年间，我从未同苏丹朋友因意见不合争吵。我的做法是一听、二看、三微笑、四耐心，有事商量着办，不操之过急。就这样，我结交了不少苏丹朋友。

7.参加义务劳动。我常常帮招待会端菜、刷盘子。那时,只有体力劳动,才算劳动;脑力劳动,不算劳动。不过,我也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,增长了不少知识和见识。上世纪90年代,我在驻约旦使馆任大使时,有些同志还仍存在重体力轻脑力劳动的思想,看到懂外文的同志看电视新闻,不出去扫院子,就十分不悦,甚至还说,“这些外交官瞧不起劳动人民”。今天,恐怕这样想的人不多了。因为时代变了,人的思想也应改变。

或许是因为我的勤奋进取,1973年3月被破格晋升为随员,时年31岁。这轰动了全馆,同志们向我祝贺,更多的谈论是我多拿了几个钱,而不是我的辛劳,有人甚至私下问我有何背景。此事提醒我要加倍努力工作,曾写下过下面几句诗:

忽闻晋升全馆惊,委以重任属实情。
 诸君笑谈增铜臭,怎知劳作夜三更!
 无形皮鞭背上抽,青春有志攀高峰。
 学海无涯苦作舟,多做奉献必有成。

(三)

对研究工作的兴趣,对我来说,是压出来的。如前所述,我每天忙于口、笔译工作,累得透不过气来。开始,我的工作都是被动的,机械的,基本上满足于完成任务。后来,才渐渐发现许多不相关的事务和信息,往往有着内在的联系。许多文章有深层的政治背景,犹如条条小溪,一旦沟通,便形成一条河流。为便于工作,我对资料进行了分类整理,分出主次,努力抓住主要矛盾,并试着写点东西。领导也认为我喜欢开动脑筋,想问题了。这使我增加了信心,并主动要求研究一些问题,变被动为主动,经常与同事们讨论分析,提出自己的看法。

调研无处不在。小至衣、食、住、行,大到国际形势、国家大事、民族兴衰,都少不了调研。当然,从事政治、外交调研更为复杂、曲折、多变和伤神。需花大力气,孜孜不倦,勤奋努力,一丝不苟,才会有所收获。实际上,调研两字分开来讲,是有区别的,调为调查,即对某一事物或课题,有针对性的收集材料、依据和事实;研是研究,应在调查的基础上,通过自己的分析加工,得出某种结

论。两者难以截然分开,而是“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”。因为,在收集资料时,人们进行了粗加工;而在研究时,也因材料不足,需继续找材料和依据。调研,首先应沉下心来做。这一点就很不易,年轻人如能坐下来,就很难能可贵。能静下来,还要沉下来,不怕苦、不怕难、不怕错、不怕寂寞;其次,要不唯上,不唯书,要唯实。在苏丹工作期间,有不少教训,最可怕的是按领导的看法去找材料加以论证,结果闹出了不少笑话。我个人认为应尊上,而不唯上,读书,而不唯书,而要唯实。有知识的人不实践,等于一只蜜蜂不酿蜜;关起门来搞调研,更是盲人骑瞎马。任何一个正确论断的产生、一项明智举措的出台或预言的实现,都离不开实践,因此,要树立实践第一、材料第一的观点。只有这样,才能做到解放思想,实事求是;第三,不断提高文字表达水平。做调研,对文字水平要求更高,最起码要做到以下四点:用词明确,不模棱两可;一字千金,言简意赅;逻辑性强,一目了然;语言通顺,如行云流水。

总之,我在苏丹工作了8年多,对个人成长意义重大,曾赋诗两首,特抄录如下:

一

男儿奋斗人世间,意气风发谱新篇。
 终日辛劳隆中事,八年苏丹凋朱颜。
 雄关漫道从头越,鹰击长空高天寒。
 赢得日出浓雾散,敢到中流挽狂澜。

二

苏丹任职逾八载,两国关系发展快。
 援建项目均竣工,当地民众笑颜开。
 大使离任赴埃塞,总统亲授勋章戴。
 赠送地皮建新馆,尼罗河畔真情在。
 双边友情人皆晓,风云变幻脚下踩。
 雨露滋润勤耕作,中苏友谊传万代。

于北京潘家园

(责任编辑:马丽蓉 责任校对:杨阳)